

佛典目录及推荐目录之溯源问题

白化文

随着二十世纪以来百余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迅猛发展,许多新的学科出现,许多老学科增添了新的内容。例如:航天科学,导弹及与之相关的学科,这都是新兴学科;物理学系统中,相对论等新理论加入,使之面貌一新。社会科学方面,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的大批卷子出土,带动敦煌学以至后来的吐鲁番学建立,现在已发展到丝路学。这都是前所未有的。

这就使目录学跟着也增添了许多内容。反映在目录与分类中。

公共图书馆以兼容并收为主旨,不甚着意反映此种变化。也就是说,往往不甚注意反映这些多种多样的变化的新兴学科的内部分类,提法,及其所产生的问题。其实,这些新的问题现在有愈演愈烈之势。

一些老学科,例如佛教典籍与道教典籍,由于老派的正统目录学往往把它们整体地排除在外,仅仅就当时作目录的人,特别是编写国家级目录的人的水平与爱好,找一些来充数,可说是不全不备。反映在公共图书馆系统中,对这些老问题也注意不够。

这就反映在,在目录学和图书史研究中,主要注目于国家级主流目录方面,忽略了某些应该改正的提法。例如:讲丛书,只从南宋时出现的一部小型丛书《儒学警悟》说起,而忽略了南北朝时已编成多种佛藏,唐代已编出道藏的两类大丛书的史实。讲我国现存的最早的完整的类书,就说是隋朝大业年间(605-618)的《北堂书钞》,但此书比起梁武帝天监十五至十六年(516-517)宝唱主编的《经律异相》,晚了近百年。而且,《北堂书钞》还有残缺,《经律异相》却是全帙。

但今天我们要讨论的,却是有关“推荐书目”的早期溯源的事。推荐书目是书目的基本类型之一,又称学习书目、导读书目、阅读书目等,是一种精选出一定范围的文献,并附有指导性意见,使读者有所遵循的书目。它的特点是:

- 1、范围可大可小,但其覆盖面只能是总括性书目之一部。
- 2、必有带某种指导性的提要。

依照以上尺度来衡量,近代以降,各个学科的推荐书目颇多。从编者角度看,基本上可分为个人(常为名人、权威)和图书馆编纂两种类型。例如,民国

年间,以“国学”范围为内涵者,梁启超先生便编有《要籍解题及其读法》,为学者所宗。其他大小型的各个学科书目,至今各图书馆多有编纂。限于时间,请读者就自家专业与爱好,自行寻觅便了。

我们这里要汇报的,乃是我国汉文典籍中推荐书目的溯源之事。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2002年第6期,刊出徐有富先生的“谈谈《经籍举要》”一文,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若干探讨,并对这几十年间提出的具体的推荐书目的溯源到某书,抒发了他的见解。其中颇有胜解。请有兴趣的读者参阅。我们仅就其中两个问题提出个人的想法。

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在于,把溯源仅仅限于清代,甚至只限于清代末期,而不往前试探,局限性太大。附言:乔好勤先生提出,元代程端礼编撰的《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》三卷,是一部“相当成熟的导读书目”,好像往前探了几步。但是,徐有富先生认为,那是一份教学计划,而不是导读书目。我们同意徐先生的见解。

另一个,即敦煌遗书中的《杂钞》是不是推荐书目。徐先生已经指出:那不是推荐书目,而是一本小型类书。由于这个问题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位目录学大师级人物提出的,图书馆学界奉为主臬,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图书馆学》第一版“推荐书目”词条中还在采用这种说法,称“中国现存最早的推荐目录是在敦煌发现的《杂钞》(伯乙171号卷子)”。这是谨守师传,未可厚非。但这个条目典型地反映出当代目录学和书史学界的一些传统看法,其中小错误较多,故而需要辨正。

按:《杂钞》残卷,首题自称“《杂钞》一卷,一名《珠玉钞》,二名《益智文》,三名《随身宝》。并序”,尾题“《珠玉新钞》一卷”。台湾朱凤玉教授有录校本,王三庆教授《敦煌类书》一书中有录文、注释、考证、图版等甚详。王氏书有丽文公司1994年版。1999年,在《一代宗师——纪念刘国钧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》中,载有拙作介绍王三庆先生《敦煌类书》的小文,全录朱凤玉先生和王先生此书重点,应署由我转录。不知何故,漏掉朱、王二先生大名,似乎成为拙作。这是完全错误的,严格说,乃是攘窃。在此提出更正,并向两位先生致歉。王先生书中所录英法所藏,大体上有十四个卷子号。计有P.2721(可作为代表性卷子),首尾完具,凡164行,约五千字左右。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条目中所说“伯乙171号卷子”,八成指的就是它。法藏并无那种编号。此外尚有P.2816,3393(可与S.4663缀合),3649,3662,3671,3683,3769,3906(可与S.5658缀合)。S.5668,5755,9491,均为残卷。全卷采问答体,抄撮常识、典实,供诵读之用,乃是一种童蒙读物。不著撰人。《通志·艺文略》及《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》均著录有“张九龄《珠玉钞》一卷”,有人认为,张九龄乃高级文士,官至宰辅,此书未必张氏所为,或系托张氏之名,以提高此书知名度与影响。此书尾题《珠玉新钞》,也可能是改编者借此说明是改编本,并非张氏原作。《大元通志条格》卷五“传习差误”条:“据村庄各社请教冬学,多系粗识文字之人,往

往读《随身宝》《衣服杂字》之类,枉误后人。”可知此书元代尚流行于民间。徐有富先生已就此书之并非推荐书目作出精当分析,我们不再赘言。

溯源推荐书目,我们在此推荐另一部敦煌出土卷子供考虑,那就是《众经别录》残卷。英法所藏,计有 S.2872+P.3747 两号。王重民先生首先发现并公布 P.3747 号卷子,先辈苏晋仁先生、潘重规先生均作过研究,有录文发表。拙作《敦煌写本〈众经别录〉残卷校释》一文,载于《敦煌学辑刊》1987 年第 1 期,其中“有关《众经别录》研究情况之追溯”一节,可供读者参阅。必须指出:对此问题进行过彻底研究的当代学者,首推方广钊先生。他发现了可与伯 3747 号卷子互为补充的斯 2872 号卷子,并作出录文与校释研究等,载于《敦煌佛教经录辑校》一书中,1998 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,亦请读者参阅。

《众经别录》是残存的中国古代最早的经录残卷。它的构造很特殊。我们谨指出两点:

一是,它是一部专科性质的大型的选择性目录。它大体上是梁武帝崇佛时期产物,看来是那时的重点寺院中专司编纂经录者所编。那时的经藏全目,如权威性的《出三藏记集》,录存经籍 2162 部,4328 卷。而《众经别录》只录有 1089 部,2596 卷。这符合我们前面所说的“大型选择性书目”的标准。

二是,它有提要。这符合我们前面所说的第二条标准。它的提要很特殊,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:

一方面,它指出,某种经典属于那种宗派,用语是“以……为宗”等。那是以刘宋时高僧慧观提出的“五时判教”的理论为根据,作出的划分。用于佛藏编目中,可称当时一种新型的佛藏分类认识。

另一方面,它评论译文风格,将之分成五类:文,质,文质均,文多质少,不文不质(指的是只音译的咒语之类)。儒家经典《论语》中“质胜文则野,文胜质则史”,这里将著作风格粗分为两大分野,用于评议佛典译文,显然是受到《论语》中这两句话影响的评议思路。说句玩笑话,乃是“援儒入佛”也。

它确实是某一种特殊类型的提要。因而,此书作为一种特殊的专科性质的推荐书目,完全合格。当然,它是一部大型书目,但不妨碍它是一部推荐书目。我们想到,胡适之先生所著《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》,曾被梁启超先生评为“大而无当”,但不能不说它还是一部推荐书目,只是一部大型推荐书目罢了。《众经别录》也是一部大型专科性质的书目,同样具有推荐书目或说选择书目性质。

笔者有个大胆假设,编纂《众经别录》必须具备至少两个条件:

一、此书赅括全藏,要有丰富的“经藏”储藏,并具有写作目录任务的“佛教图书馆”。也就是说,要有基本上编好全部藏书目录的馆,要有书,编纂者还要时常看到书。这在古代并不容易。最靠谱的是,只有此类大型“图书馆”的管理与编目人员才能近水楼台。

二、文质之辨,由儒及佛,兼具当时清谈“题目”即品评性质,非兼通三教

擅长文学批评之大知识分子莫办。

南朝齐末梁初,具备这样的条件的,首推僧祐领导的一批高文化僧人,编纂与安设大型“经藏”之地为定林寺。

《梁书·刘勰传》:“早孤,笃志好学。家贫,不婚娶,依沙门僧祐,与之居处。积十数年,遂博通经论,因区别部类,录而序之。今定林寺经藏,勰所定也。”

《众经别录》研究中的主要问题之一,是 P.3747 和 P.3848 两号的定位问题。拙作《敦煌写本〈众经别录〉残卷校释》一文,其中第一节是“有关《众经别录》研究情况之追溯”,对此作出了概略分析,请有兴趣的读者参阅。具体地说,P.3848 号不是《众经别录》残卷。王重民先生原来不误,只是后来录入时,恁老人家自己剪贴进稿纸时,前后看岔贴错了。以至施萍亭先生等位重编《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》时,还不敢辄自改动,依然将其标称“《众经别录》”。可是,在 P.3747 号上标示:“《众经别录》,说明:仅存卷一卷二,卷一开端残缺。此据白化文定名。”这对我来说,诚乃不虞之誉。因为,P.3747 号卷子之定名,从原始上说,肯定是王重民先生所定,不宜因 P.3848 号之录入错误,削去王先生定名之功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